

屈原及其
《九歌》
研究

蒋南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屈原及其《九歌》研究

蒋南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 迅
封面设计 王 橘
版面设计 杨林栩

屈原及其《九歌》研究

蒋南华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125印张 120千字 2插页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

ISBN7-221-02654-8/I·306 定价: 3.00元

目 录

伟大的民族诗人——屈原	1
《九歌》研究概述.....	11
一、“九歌”释名.....	11
二、《九歌》的写作地点与年代.....	15
三、《九歌》思想内容及其艺术成就.....	37
《九歌》释译.....	64
东皇太一.....	64
云中君.....	68
湘君.....	70
湘夫人.....	79
大司命.....	86
少司命.....	90
东君.....	95
河伯.....	99
山鬼.....	103
国殇.....	107
礼魂.....	111
屈原生年考辨.....	113
试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伪.....	144

伟大的民族诗人——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生于公元前三四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日^①。他出生于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王族，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②的政治活动家。他生活的年代与商鞅、申不害、孟轲、惠施、庄周、陈良、许行和邹衍、公孙龙、荀况、韩非等诸子百家相去不远。那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十分繁荣活跃的时代。屈原从小就受到了各家的进步思想的熏陶。因此，才智绝世“重以修能”的屈原很早就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他希望自己的国王能“抚壮弃秽”、“圣哲茂行”，学习前人治国的好经验，对内进行政治改革，“举贤授能”、“奉公昭下”、“明法审令”、富国强兵；对外建立友好的和平邦交，从而使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集“众芳之所在”的繁荣富强的国家^③。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还再三向楚王致意表示自己愿意作“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他在二十四、五岁时，即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就当上了仅次于上官大夫的“左徒”

大官（左徒即左登徒之简称，是楚国兼掌内政、外交的要员），“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④，很受怀王宠信。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套美好的政治主张却遭到了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猛烈反对与攻击。这些“竞进贪婪，不厌求索，怨己量人，兴心嫉妒”⑤的奸党小人，处处寻找机会来谗毁、陷害这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有一次屈原在草拟一个重要的（有关改革楚国内政和外交的）宪令，上官大夫见到后，便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要屈原改变原稿内容。“正道直行”、“受命”“明法”的屈原严厉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这样上官大夫便找到了中伤谗毁的借口，他对怀王说：“王使屈平为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⑥妄自尊大、虚荣心极重而又浅薄无定见的怀王偏听偏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不问青红皂白，（“不清澄其然否”）⑦，就把“竭忠尽智”⑧的屈原疏远了，甚至还罢去了他的左徒官职，叫他去做教育、管理昭屈景三族子弟和掌管宗教祭事的“三闾大夫”。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楚国乃是七雄之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楚武王（熊通）开基立业，到屈原这个时代，楚国已经在南方经过了几百年的独立发展。它的疆域已经包括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大部，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各一部份，是当时战国中疆域最大的一个国家。在生产技术方面，它生产的铜器、铁器、丝织、刺绣、木器、竹编、漆绘以及料器等均极见功力，十分先进，国家的经济物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据《左传》记载：楚成王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楚，楚子飧之，

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重耳这番回答对楚王虽然不免有些恭维，但从楚王曰“虽然”的口气来看，“广而俭，文而有礼”的晋公子也至少不是阿谀奉承）。在军事上它使用先进的铁制戈矛，“剑利”、“士勇”^⑩，兵强马壮，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三晋，西伐秦”^⑪，几度打败和征服过它的邻国，并且在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楚国还第三次当上了山东六国联合抗秦的从长。（当时楚国的强盛，特别是楚国与齐国的结交，成了秦国最大的忧患^⑫。应该说，楚国如果能像屈原所希望的那样，能“望三五以为像”，“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那么楚国统一中国是完全可能的了。然而“浩荡不羁”，“中道回畔”的怀王却听信了“众口其铄金”的奸党小人的谗言，把“信谗练要”^⑬的贞臣屈原疏远了）。

（位于楚国西北的秦国，随时都窥视着楚国的一举一动，想要从中取利。因此，屈原的被疏，对它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样，在怀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13年），秦惠王便马上派遣了阴谋家张仪出使楚国。张仪一来到楚国便以一种贿赂拉拢和欺诈的手段，很快获得了昏庸贪利的怀王的信任（“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凭着张仪一句“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的谎言而与齐国断绝了多年来的邦交。当怀王使将军到秦受地时，张仪则装病三月不出，昏愚的怀王还以为“吾绝齐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使得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齐楚同盟被瓦解后，张仪乃起朝对楚将军说：“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

六里。”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一怒之下，便兴兵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结果在丹阳一战（怀王十七年春）被秦打得大败，不但死伤甲士八万人，大将军屈匄和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当了秦兵的俘虏，而且被秦夺去了汉中之郡（今陕西南郑县）等大片土地。怀王于是又举全国之兵与秦战于兰田，结果又是大败^④。在这血的教训中怀王意识到了与齐国绝交的错误。于是便诏令屈原出使齐国，以恢复旧交。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屈原，当然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出使齐国恢复邦交的任务（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

秦国听到屈原出使齐国恢复旧交的消息，十分忧患。于是便决计以“汉中地之半以和楚”（怀王十八年），楚王说：“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听了这话，便胸有成竹的来到了楚国。善于见机行事，奸诈成性的张仪，一到楚国便又很快地用重金等各种手段收买了上至王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公子子兰，下至朝廷文武百官中的卖国亲秦的奸臣邪党。因此，他又诈骗了昏庸无度的怀王，得到了怀王的善遇，“秦楚合亲，约为婚姻”。这时正值屈原从齐国归来，他便谏王说：“何不杀张仪？”怀王方才后悔，派人追杀张仪，这时张仪早已回秦国去了！^⑤

由于怀王的朝三暮四，“猖披”“数化”、“中道改路”^⑥……使得齐楚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名义上齐、楚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实质上谁也没有对谁进行过认真的援助，甚至有时两国之间还发生不幸的流血战争（如：怀王二十六年齐、韩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而去^⑦……）。这样，孤独无援的楚国，在与秦的战争中每每处

于失败的境地（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而去^⑧……）。战争的屡次失败，怀王更加动摇妥协了。公元前二九九年（即楚怀王三十年），在秦国的威胁引诱和卖国投降派上官大夫靳尚、公子子兰等的怂恿下，怀王终于拒绝了屈原“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⑨的苦心谏阻而入武关与秦昭王“相约”结盟。结果，果中秦王机彀，“秦伏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忧愤而死。

怀王的囚死于秦，这是楚国人民莫大的耻辱。它引起了楚国人民普遍的不满和极大悲愤，竭忠事国、“重仁袭义”^⑩的屈原更是悲愤不已，在极端的愤慨之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严厉痛斥了“专佞慢慝”的上官大夫和“无实容长”^⑪的公子子兰等卖国投降集团的可耻行径。这样屈原与他们就更是处于势不两立的地步了。而新继承王位的顷襄王（熊横）又是一个“腆颜事仇”、认贼作父的无耻昏君。他不但没有器重竭忠尽智，“怀瑾握瑜”^⑫的屈原，反而听信了卖国亲秦的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的谗言、毁谤，竟恩将仇报地把屈原赶出了朝廷。从此（顷襄王二年即公元前298年以后），屈原长期过着东飘西荡，无家可归，有国难投的孤苦潦倒的流放生活。

二

在至终“不见省纳”^⑬的长期流放生活中，屈原出国门、遵江夏入洞庭、济沅沅、涉澧水、上辰阳、入溆浦……其足迹遍及两湖，特别是沅湘之间的广大地区，因之更进一

步接近了人民，熟悉了人民，了解了人民，也进一步看清了“櫓弋机而在上兮，尉罗张而在下”“凤凰在笱，鸡鹜翔舞”，“伍子逢殃，比干菹醢”，鸾鸟日远，鸟鹊巢堂，腥臊并御，阴阳易位^④的朝廷政治的腐朽、黑暗和奄奄待毙的楚国的惨淡前途。他为祖国为人民的前途忧心郁悒、疾痛惨怛，以至“颜色憔悴，形容枯槁”^⑤，他的宏伟奔放、沉郁悲壮、冠绝今古的《离骚》，雄浑奇特的《天问》，明丽哀志的《九章》，瑰奇艳丽的《招魂》和深思高举的《远游》以及清新典丽、缠绵悱恻的《九歌》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⑥的伟大诗篇，就是这种忧国忧民的血泪的结晶。

在这些雄伟悲壮而又怆惊欲泣的诗歌里，诗人如泣如诉地叙述了他“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和“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嚮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贅疣”^⑦的愁思苦衷；如思如慕地倾诉了他对人民的深沉的爱；如火如荼地大声斥责了奸臣邪党们“偃规矩”、“背绳墨”、“竞周容”、“贪婪”、“嫉妒”的卑鄙行径和他们卖国求荣，给祖国，给人民带来的极其深重的亡国灾难！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纯粹耿介、志洁行廉的屈原虽然长期流放在外，过着“紕思心以为纆兮，偏愁苦以为膺”的“长穷”“无乐”的生活^②，但他所忧虑痛惜以至哭泣的，全不是他自家的“离别”与生死的安危：“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顼顼亦何伤！”“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所忧虑所痛惜的是“恐皇舆之败绩”，是那“数化”“浩荡”“不察民心”的国王！是他的有“招祸之道”的祖国和多灾多难的人民。^③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直若砥矢，言若丹青的屈原，他冒着“体解”的危险，蹇蹇向王进谏，他希望自己的国王能赶快悬崖勒马，觉悟过来，不要至昧不悟地苟安于“时俗之工巧”而违背了“前脩”的法度！希望他能像“遵道而得路”的古代贤君尧舜、汤武、齐桓那样，能“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能“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希望他看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的两种不同的政治道路而决定己之取舍。最后他还频频告诫楚王，希望他记住：“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的历史教训。他大声疾呼楚王不要把他亲爱的祖国引导到“车覆”“马颠”的“幽昧以险隘”的“异路”上去！^④

（然而，至终不悟，偷乐于谗人的“佞媚”“虚惑”的“壅君”^⑤对这些忠诚的劝谏和希望却一概置之不理，“详

聒而不闻”！“怀信佗傺”、“博謇好脩”^②的屈原对此是多么痛心疾首啊！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③他内心真是难过矛盾极了！他甚至想“摇起而横奔”，“高飞而远集”^④，离开这个“画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的“溷浊”“嫉贤”“蔽美称恶”的肮脏时世！而趁着自己“余饰方壮”的时候，去“周流观乎上下”^⑤，但他想到祖国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他便“盖志坚而不忍”，“览民忧以自镇”了。^⑥

是的，“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洁白清忠的屈原，他怎能忍心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呢？连他的马也怀念着自己的“旧乡”而不忍离开啊！^⑦

屈原虽遭流放在外，但他“何日夜而忘”记过他的楚国和郢都呢？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霏，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

——《九章·哀郢》

祖国的乡土，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四季的推移和昼夜

长短的变化，都无一不引起他惊心动魄的感触和如焚若荡的故国之思。在他的许多诗章中，诗人忧心如焚，悲壮淋漓地哭诉了他的这种回肠九折的情感：“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九章·抽思》）。“入溱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九章·涉江》）。“观炎气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九章·悲回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九章·怀沙》）。“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

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屈原就是这样把自己对祖国人民的忠诚的爱，熔铸在自己的“金相玉质，百世无匹”^⑤的诗篇里。当他看到人民妻离子散，颠沛流亡的惨象时，他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早吾以行”（《哀郢》）的呼天抢地的哀号。最后，当公元前二七八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的将领白起拔取了楚国的郢都，铲平了楚国先王的陵墓，爱国忠义的屈原再也不忍眼见楚国的沦陷和人民亡国的痛苦，便在这年的夏历五月五日愤投汨罗江而自杀了。

三

屈原的一生是伟大、壮丽、战斗的一生。他不但以他的

“奔放的感情，像夏云似的舒卷自如，奇峰突起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像烂漫的春光似的辞华”^③恣意地编织了万古不朽“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的伟大诗章，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二千多年来我国诗歌发展的道路”^⑤；而且以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他永远是“我们民族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反抗暴力侵略，争取自由幸福的光荣传统”^⑥的象征。屈原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最早的登峰造极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珍贵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伟大精神财富。屈原和他的诗篇，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屈原的名字成了忠于国家坚持正义的一面旗帜”^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九歌》研究概述

一、“九歌”释名

“九歌”传说原是夏代流行的抒情古曲。《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这种可以使人“康娱自纵”的乐曲，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到人间的。《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主）上宾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天问》也说：“启棘（梦）宾商（天），九辩九歌”。不过早在屈原以前一千多年这支古曲就已失传了。因此即是比屈原早生两百余年，曾周游列国，自称“夏礼吾能言之”的孔子，也对这支与韶舞齐名的古曲茫然无知。屈原借用这支带有神奇色彩的古曲的名字，他根据“南郢之邑，沅湘之间，信鬼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的风俗习惯，以及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用典型的个性化语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重新创作了《九歌》这支出类拔萃芬芳绚丽、百世无匹的奇葩。

《九歌》共十一篇（实应为九篇，《国殇》和《礼魂》除外，其理由将在下文中论及），它是屈原晚期放逐江南“聊以舒吾忧心”（《思美人》）， “荡志以愉乐”（《哀

郢》)的忠君爱国、忧世伤时之作,是“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朱熹《楚辞集注》)的抒情短歌。

历代注家从东汉的王逸开始几乎无不把《九歌》说成是“楚地民间的祭歌”(如陆侃如),是“祀神歌舞”(如文晓),是“祭祀的歌词”(如董楚平),是“鬼歌”(如程嘉哲),是“人神恋爱的巫歌”(如苏雪林、闻一多),甚至有人说:“九歌实际上就是‘天歌’,亦即‘九天五宫十神之歌’的缩略语”者(如何新)。这些说法都是不无问题的。我们将在分析《九歌》的思想内容时予以商榷。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学者何新1987年5月在哈尔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揭开〈九歌〉十神之迷》的文章,提出:“《九歌》中的十神(五男五女)系统,具有一种相当整齐有序的内在结构,它暗合于先秦流行于中原地区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所以其来源乃是战国末季始创于齐国的东、南、西、北、中方十神系统”。并说“那种认为《九歌》中的十神与中原的诸神关系不大,是楚国所特有的观点,是荒谬的。《九歌》名九,却有十一篇,其原因即在:‘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之数。因此,九歌实际上就是‘天歌’,亦即‘九天五宫十神之歌’的缩略语”。我们反复读了这篇“揭开一个千古之谜”的文章,感到何新的观点确实十分新奇,发前人之所未发。但要说凭着这些就揭开了《九歌》千古之谜,则恐怕未必。其一,何新把河伯与东君,湘君与湘夫人,少司命与大司命,国殇与山鬼,东皇太一与云中君匹配为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五对配偶神,并说这是根据“一种相当整齐有序的内

在结构”来进行的。可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找不出《九歌》中的这种“整齐有序的内在结构”。就以东皇太一与云中君，国殇与山鬼为例来说吧，何新说：“在《九歌》中，与东皇太一相妃配的女神就是‘云中君’。”他说“云者，阴也，隐也。”“原来这位隐君子——云中君，就是战国秦汉时代那位赫赫有名，威力无边的宇宙司阴大神——太阴君。”何新用一句“云者，阴也，隐也”，再加上一个“原来”、“就是”，就把云中君的性别和地位界定了。为了证明其论说的权威性，何新抬出了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太岁考》，说是“太阴别名有六：‘太岁一也，太阴二也，岁阴三也，天一四也，摄提五也，青龙六也。《尔雅》谓之太岁，《史记·天官书》谓之岁阴，《甘氏星经》谓之摄提’。”何新还提醒道“特别要注意‘摄提’这个名称，求上古音，摄提可读如‘匿地’。正是隐匿神秘之义”云云。说了这么一大通，结果我们不仅不能从中找出东皇太一与云中君“相妃配”的“内在结构”，也找不出云中君是女性的依据，而且也看不出云中君与“太岁”、“太阴”、“岁阴”、“天一”、“摄提”、“青龙”之间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丝毫联系。何新同志也许不明“太岁”、“太阴”、“岁阴”及“摄提”为何物，竟把王引之关于中国古代的岁星与太岁纪年法问题的有关考证，扯来作为云中君是东皇太一的“妃配”的论据，实在使人愕然！

关于国殇与山鬼是否是“北方”的一对配偶神问题，只要认真读读《国殇》和《山鬼》就会发现：“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左骖”和“右”，即左右骖乘，指的是人，不是马）①。